

· 四川国际友城丛书之三 ·

蜀国 漂流记



[日]川口孝夫 著



张建国
段小丁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谨将此书献给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七年

蜀国飘流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成都

特约编辑：任长安

责任编辑：骆晓平

装帧设计：竹 青

蜀国飘流记

[日] 川口孝夫 著

张建国 段小丁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宏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32 印张 5.375 插页：8 字数 140 千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4699-5/K·631 印数：1-2000册

定价：18.80 元



川口孝夫先生近照



重庆市歌台子原中共中央第七党校校门(现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门)
(二章)。



一九九二年八月，川口孝夫先生(左三)在成都市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同校领导与同事合影(三章)。

1986年9月,原
彭县副县长陈开翠女
士(右一)访问日本,
川口孝夫先生在札幌
热情会见(五章)。



一九九二年八月,川口孝夫
先生(中)在彭县,与农业局原同
事周显明、余承冬、孔露露、马兰
华等合影(五章)。



1997年 在彭州银厂
沟。陈开翠女士与徐晓霞女
士(五章)。



1997年,彭州市自由市场的
猪肉市场一角(五章)。

1997 年 12 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北京同张香山先生(左)、刘邈先生在一起(六章)。



一九九六年九月，赵安博先生夫妇(右二、左一)在北京同川口孝夫和川口荣子在一起(六章)。

1987 年 5 月，川口孝夫、川口荣子夫妇在北京同段元培先生(左一)、张香山先生(右二)合影(六章)。





1997年12月,川口荣子在北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大门前留影(六章)。



1997年12月,川口孝夫和川口荣子在北京万寿宾馆(六章)。



一九九二年八月,川口孝夫在成都市成都机床厂,同钣金熔接车间的年轻同事合影。左起赵长明、陈长明、曾桂先、王秀英等(七章)。



1998年 位于成都市人民南路尽头的毛泽东大理石像(1969年竣工)(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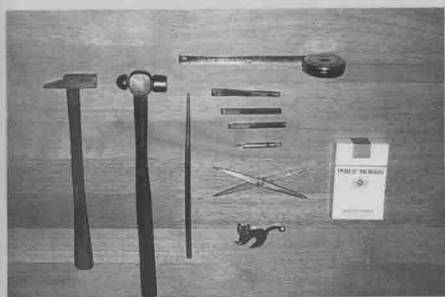
1981年1月,川口孝夫和川口荣子同成都机床厂熔接技师唐淑华女士(中)在一起(七章)。

1992年8月,川口孝夫(前排左二)在乐至县四川省沱江汽车配件厂厂房前,同李兴容师傅(前排左一)、唐忠华师傅(左三)和卓必模技师(后排左三)等合影(八章)。





1981年1月，川口孝夫先生（中）在乐至县农机厂，同实习工人唐忠华（左）和吴大富合影（八章）。



川口孝夫先生在工厂时制造的部分工具（九章）。



一九八一年一月，川口孝天（中）同川口荣子（右一），在成都红旗柴油机厂，同魏金玉师傅（左一）、李渝晨（后左）、耿培德班长（后右）在一起（九章）。



一九八七年四月，川口孝夫夫妻二人，在成都柴油机厂，同工具班的同事合影。左起耿培德班长，高燕英、曾智松、段少春等（九章）。

序

《蜀国飘流记》一书，由我在中国生活的17年间的回忆构成。由于有关在中国度过的那段岁月的无论是照片还是文字记载我一概全无，因此，本书是全凭着我的记忆完成的。为了使回忆尽可能准确，我竭尽全力地将自己的记忆同妻子的记忆相核对。尽管如此，我心中仍存有一丝不安，如果记忆有误，望读者谅解。

我在中国逗留的那段岁月，正逢建国后新中国急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同时也正是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发展的时期。“三大改造”所隐含的急躁和“左”的倾向，逐步演变为其后的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四清运动，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主宰着中国，在每年都反复发动的政治运动中，谁也不敢讲真话，维护人民利益的党员和干部被处分。尤其在“文革”中，几乎所有的干部都被打倒，全社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这一时期，党和人民饱受涂炭之苦。

我面对这一系列事态，当初认为，毛泽东的方针和领导没有错，混乱的根源来自于执行毛泽东的方针和路线的基层干部。但是在“文革”中，到了我自己也被打倒的地步，终于，我开始对毛泽东及其指导思想产生了怀疑。从那以后，我下定决心，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其他人，判断他的讲话正确与否的标准应该是看其与客观实际是否符合，也就是说，要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

回国以后，我把以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待一切事物作为信念，对于在中国逗留的岁月里不能理解的问题，我不是依据书本上的教条来简单地下结论，而是在现实发展的进程中作出判断。然而，对于“文革”中达到极点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本质究

究竟是什么？并且，为什么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的问题，长期以来，我未曾见有可供自己作出判断的资料公开发表。我在思想上一直处于困惑状态。这段时期，我埋头翻译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以此来分散注意力。正在这时，我阅读到在庐山会议召开期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的大作《庐山会议实录》。有句话，叫做“头屑从眼睛里落出来”（此语出自《新圣约全书》，意即因某事突然开悟。译注）。通过阅读此书，我感到过去不甚了了的中国问题云消雾散一般豁然明朗。之后，我于去年12月和今年3月两度在北京拜会了李锐先生，征得他的著作《庐山会议实录》在日本翻译和出版的许可。而且，我还郑重地请求著者撰写了日文版序言。此外，就李先生所著《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一书，也征得他同意在日本出版。目前，日文译稿的校订工作正在进行。我考虑通过学习这两本书，今后将进一步加深认识，努力研究毛泽东和中共党史。

对我而言，在中国的17年生活确实不是依照我自己意志的选择。另一方面，我认为其间收获颇多也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能够把实事求是作为思想方法和态度融会贯通，乃是我最大的收获。对于把我流放到中国的借口——“白鸟事件”，我决心一如既往地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探明真相。

《蜀国飘流记》一书是在未曾阅读李锐先生的大作之前脱稿，也即是依照我的旧的认识水平写成的。因此，对当时发生的事态的记述，现在看来，不能否认在思想、理论上都存在缺陷。各位如能不吝赐教、批评，我将深感荣幸。

此外，我怀着真诚的感激之情，将此书奉献给那些在我最痛苦最困难的时期，曾在思想上、物质上给予我鼓励和帮助的中国朋友。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衷心感谢在精神和物质上给予我无偿支持的许多朋友。

川口孝夫

1998年12月23日

中文版序

此次，由四川省外办的张建国女士、段小丁先生翻译的拙著《蜀国飘流记》的中文版在四川省正式出版发行。正如书名所言，我在中国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四川省度过。对于离乡背井的我而言，在言语不通，情况不明的异国他乡，首要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又如何回到祖国人民的怀抱。

这时，我只有一条路——即在抱着回国的希望的同时，在中国社会里同中国人民共同生活下去。具体而言，就是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我自己的事业，同中国人民共同劳动、生活。

中国人民把如此境遇中的我作为朋友温暖地接纳，在思想上、物质上给予了我无私的支持和帮助。我对自己的一生中在思想上处于最苦闷的时期所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真诚帮助终生不忘。

日本固然是我的故乡。四川也是我的故乡，我的第二故乡。

回国已经25年，终于经第二故乡的朋友们之手，《蜀国飘流记》中文版得以正式出版，这于我是何等欣喜的事。

此逢拙著《蜀国飘流记》中文版出版之际，我回首往事，浮想联翩。我满怀感激之情，将此书奉献给四川的朋友。

由于我的思想水平不高，想必该书存在不少错漏和与事实不相符合之处，这一点诚望各位朋友批评、指正。

最后，值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为此书竭尽翻译之劳苦的四川省外办的张建国女士、段小丁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的任长安先生、邓星盈先生和骆晓平先生表示我最衷心的感谢。

川口孝夫

1999年4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初到中国	(1)
第二章	在重庆歇台子	(8)
第三章	卷进“大跃进”的漩涡	(20)
第四章	跋涉长征之路	(43)
第五章	在彭县的日子	(60)
第六章	身陷“文化大革命”	(84)
第七章	再返成都	(112)
第八章	战备疏散到乐至	(119)
第九章	踏上归途	(136)
第十章	我与“白鸟事件”	(154)
跋		(161)
译后记		(163)

第一章 初到中国

1956年北京五一国际劳动节

北京的五一阳光灿烂。

一大早，我们由中联部（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原注）的妇女干部和招待所的服务员带领着，离开了投宿的宣武区招待所，为的是去参观五一节庆典。刚抵天安门（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没有现在这样宽，只限于东西长安街口以内。原注），我们被带到后来建成历史博物馆的位置，进入已经到场的劳动模范的行列中。在绝大多数身着藏青色棉布中山服的人群中，有一列身着咖啡色哔叽中山服的男士和淡红色干部服的女士的队伍特别引人注目。

我在日本，进行了6年的反政府的地下活动。来到解放的新中国以后，我切身体会到一种仿佛头顶的石头被搬掉的解脱感，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尤其是，这是在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里度过的五一劳动节，我心中涌起由衷的喜悦。

我抬头向天安门城楼望去，楼上还人影稀疏。然而在下面的观礼台上，在面向天安门的长安街南侧，还有通向前门的道路的两侧，已经挤满了参加庆典的人们和欲亲眼目睹游行队伍的观众。从天安门前到长安街北侧，一队解放军战士保持着等距离间隔列队伫立。事后我打听到：“为什么警戒如此森严？”回答是：“以前曾发生过反革命分子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的事件，所以警戒是必要的。”此时我才知道，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都是万岁万万岁的。

我们所站的位置距天安门城楼太远而看不太清楚，好像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外国来宾陆续莅临天安门城楼。我听到身旁的中国人似乎在议论道：“像是毛主席。”对于中文一窍不通的我来说，他们说啥，我一脸茫然。这时，主持人宣布大会召开，庆典开始举行。天安门城楼上在宣读着大会的祝辞。由于没有翻译在身旁，我听不懂内容。然而，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激动流贯全身，泪水涌了出来。把解放后举国欢庆的中国的五一劳动节同象征着“血腥的五一”的日本的五一劳动节相比较，我感慨万千。

在巨大的五星红旗的导引下，游行开始了。载着巨型机械模型的卡车和工人队伍，满载小麦、大米、棉花的大车，成功地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后建立起合作社的农民队伍，城市手工业者的队伍，公私合营以后的城市工商业者的队伍，少先队、共青团、中学、大学的青少年学生队伍逐一通过。车上的舞台正在演出《万水千山》等剧目，继而是大队的文艺团体的表演者占满了游行通道，移动中表演着集体舞。川流不息的游行队伍一浪高过一浪，一直持续到下午。

这年的五一节庆典是在取得了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化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整个会场沉浸在“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万岁”的气氛中。游行队伍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经久不绝。